

後結構主義社會網路研究： 以一所打工子弟學校歷時性危機事件的 界面分析為例

周彥汐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摘要 基於後結構主義網路研究對於標準社會網路研究的批判及自身研究成果鮮見之情形，本文借助一所打工子弟學校歷時性的四次危機事件，嘗試為後結構主義網路研究提供一種可能的研究方法——“界面分析”法及與之配套的一種可能的社會網路圖示——“危機—策略”視角下的網路動態圖示，並同時借助由此得出的打工子弟學校社會網路一般化模型，彌補當前國內關於打工子弟學校研究領域的某些局限。

一 問題的提出與訴求

社會網路研究因具備“可以進行多層次的分析，從而連接微觀與宏觀”以及“整合定量、定性資料和圖表資料，使分析更加透徹和深入”¹這兩大社會科學領域傳統研究方法所不具備的基本特徵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關注並廣泛應用在對各種社會現象的考察中，且這種關注與應用已經超越了學科界限，構建了一個“研究者們一起努力，相互影響，共同構建積累性的知識共同體”。²然而至社會網路研究日益成熟，成爲一種範式後，其存在的基本導向——“只研究靜態社會結構，忽視具有能動性的行動者”³就被廣爲詬病：有研究者在30多年前曾公開指責網路分析中存在的



那種“過分關注技術與資料，以及堆積許多無關緊要之結果”的趨勢；⁴ 有的研究者對此種導向的態度相對緩和，但也為社會網路研究中缺乏那種“完全恰當的可用以說明社會網路本身實際如何形成、複製和演變的解釋模型”而惋惜。⁵ 正是在此種情境下，一些學者受後結構主義思潮的啟發，主張一種強調對社會網路變動性、主觀性及暫時性的研究理念，以對抗那種標準的社會網路研究中對結構穩定性及客觀性的秉持。⁶ 這種後結構主義網路學派的研究訴求對於社會網路研究的完善及發展無疑是極有裨益的，不過其在具體應用上，或許其方法的獨特性、多樣性與標準的社會網路研究範式相去甚遠，那種明確採用後結構主義網路學派視角進行研究的成果幾乎罕見於公開發表的刊物中，從而使其猶如蒙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產生一種欲用卻不知何處著手的困境。有鑒於此，筆者嘗試通過一項具體案例，結合界面分析法，去探尋一種可能的後結構主義社會網路研究——呈現一種動態的社會網路及行動主體的自我建構；而之所以稱之為“可能”，是因為採用什麼樣的方法、呈現什麼樣的社會網路圖在後結構主義網路研究中尚無定論，這對於只能秉持其學派理念所進行的嘗試性研究來說，可能隨時都存在著被排除在外的風險。簡言之，基於後結構主義網路研究對於標準網路研究的批判及自身研究成果鮮見之情形，本文欲達至這樣的一種理論訴求，即在後結構主義網路研究的理念下，關注處於城市邊緣中的打工子弟學校的社會網路，通過對這種網路動態化的呈現，為後結構主義社會網路研究提供一種可能的分析方法及圖示。

此外，對於打工子弟學校的關注，不僅源於後結構主義網路研究對邊緣群體關注的強調，也源於當前關於打工子弟學校的研究存在的諸多局限：目前國內現有對打工子弟學校的研究，通常只偏重於學生的身心健康⁷、認知能力⁸、教師的培訓⁹、師生關係¹⁰、學校的軟硬體環境¹¹、面臨的問題和對策¹² 等方面的主



題，方法上常側重於一般性的問卷調查¹³，部分採用與公立學校的對比分析¹⁴，深度個案分析則較為少見；這種主題與方法的相對局限，使成規模的研究結論趨於一致，即將打工子弟學校存在的種種問題，歸結為資金有限、辦學條件差、無合法資質等¹⁵。這些結論或許在解決打工子弟現實問題上能有所幫助，但其對學校能動性的忽視，對其如何建構了可以化解一次次危機並維繫其生存的社會網路的忽視，會阻礙對打工子弟學校自身及外部生態環境的深入瞭解，從而難以提出真正行之有效的合理化建議；有鑒於此，筆者希望借助本文達至這樣的一種現實訴求：即基於學校危機事件，得出關於打工子弟學校社會網路的一般化模型，對當前的研究局限加以彌補。

統言之，本文的理論訴求與現實訴求是一體兩面的關係，“如何通過對一所學校個案式的分析展現一種動態化的社會網路”這一現實訴求的自身呈現就是全文的理論訴求之所在。

二 後結構主義社會網路研究的基本特性

雖然後結構主義社會網路研究尚處於方興未艾中，在研究主旨、方法、旨趣上還未像標準的網路研究那樣有較一致的共識，但從現有的一些研究來看，筆者非常認可馬汀·奇達夫 (Martin Kilduff) 與蔡文彬 (Wenpin Tsai) 對後結構主義網路研究特性方面的總結，而這些特性也是本文兩大訴求的基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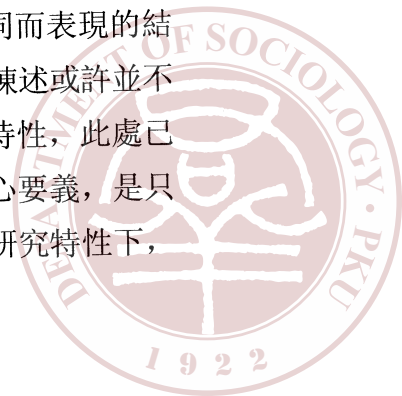
誠如前文所述，後結構主義社會網路研究是基於對標準的社會網路研究那種只關注靜態結構、忽視行動者能動性的基本傾向進行批判而建立的，其根本的意圖在於強調“變動性、主觀性、情景化與多樣性對於網路研究的重要意義，使社會網路研究領域能夠出現百家爭鳴的複雜局面”。¹⁶ 結合相關研究，筆者



認為一種後結構主義社會網路研究相比較標準的社會網路研究有以下特性：

- 1、在研究主旨上，後結構主義社會網路研究強調：(1)網路研究應對網路的主觀感知及主體能動性等給予全新的關注。(2)網路研究應多關注短暫的關係、個體身份的多變性以及行動者的異質性。(3)網路研究應對文化、歷史等社會情景給予更多的關注。(4)網路研究還應考察人類行動者與其所在環境中其他非人類行動者之間的連接，重視語言的媒介性，挑戰虛幻的研究進展恢復那些歷史上重要研究成果的地位。¹⁷
- 2、在具體研究方法上，後結構主義社會網路研究不再完全依賴問卷調查及那些使得差異均質化的方法，不再追尋那種充斥著各種理論、方法和軟體的烏托邦式的範式，而是傾向於選擇那些能夠突出個體或群體社會網路之獨特性（如網路節點關係、網路圖解法、社會網路圖或運算法則上的獨特性）的方法，向作為網路學派之源的人類學回歸。¹⁸
- 3、在研究所能帶來的公眾利益上，後結構主義社會網路研究傾向於關注那些邊緣，弱勢的行動者，通過開展與之相關的研究活動，提醒人們要注重研究的實踐意義，從而設法改進其所處世界的狀況。¹⁹

簡言之，後結構主義社會網路研究者認為“與其像結構主義者夢想的那樣試圖建立起一套網路運作的規則，還不如去探索廣泛範圍內的一系列網路過程及其隨時間及背景不同而表現的結果。”²⁰ 誠然以上就後結構主義社會網路研究之特徵陳述或許並不全面，但筆者認為即使遺漏了哪怕某些可能的重要特性，此處已呈現的種種特性都將是後結構主義網路研究中的核心要義，是只能加以補充完善而無法取代推翻的。也正是在這些研究特性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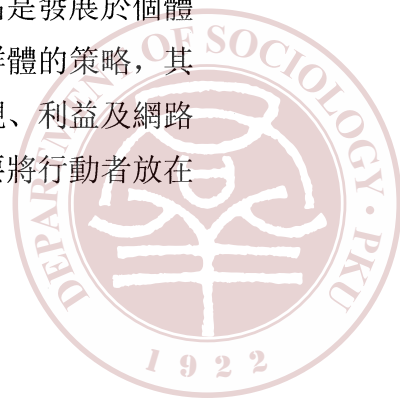


驅使筆者對如何呈現出處於城市邊緣的打工子弟學校的社會網路及動態演化產生了研究興趣，並進而生成了全文的現實訴求。

三 界面分析——一種可能的後結構主義社會網路研究之方法

當後結構主義網路研究強調對行動主體的關注、對網路動態演進的關注之時，那種打包到網路軟體程式中的各種分析方法將難與之相適宜：因為這些打包軟體關注的是網路的密度、層級、相依性及嵌入性等，而沒有涉及到對主體能動性的分析；而在動態網路的研究上，軟體程式雖然並不排斥，但由於成規模的歷時性資料難以獲得，使得基於社會網路的縱貫研究相對缺乏。²¹ 簡言之，在標準的社會網路研究中，其成熟的軟體分析包雖然能夠支援動態網路的研究，但在行動主體的能動性上基本缺乏作為，因而若實現後結構主義網路學派的意圖，必須對軟體程式加以設計改善或者選擇新的分析方法。然則軟體程式非筆者能力所及，而那些已被提及的基於案例分析或參與性觀察的研究依然是依託了較大規模的資料樣本，並且關注對象都是以企業組織為主，²² 不適合移植到將打工子弟學校作為網路行動主體的研究中。以上種種，促使筆者嘗試去從其他的研究中借鑒一種恰當的分析方法，下文所述“界面分析”就不失為其中的代表。

界面分析 (interface analysis) 被認為是以行動者為導向的研究中常常用到的一種分析方法。²³ 此方法關注的重點是發展於個體或群體之間的聯結與網路，而不僅僅只是個體或群體的策略，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展示行動者的目標、感知、價值觀、利益及網路關係是通過怎樣的過程得到鞏固或重塑的，並且要將行動者放在更寬泛的制度與權力領域中加以討論。²⁴



界面分析是對“社會界面”進行研究的一種方法。那麼何謂“社會界面”，其實“社會界面”是一個需要在具體運用時，結合特定對象才能加以充分定義的一個概念：如諾曼·龍(Norman Long)基於拉丁美洲的案例研究與經驗資料，在研究區域發展、移民、小企業及社會變遷等主題時，引入了界面概念，將其定義為“生活世界(lifeworlds)、社會場域(social fields)或社會團體(social organization)相交匯的地方，也是社會不連續性存在的地點。”²⁵；而昂德爾曼(Handelman)研究存在於以色列社會保障及紐芬蘭兒童照料中官方與客戶的矛盾衝突時，將“界面”概念定義為“聯結的關鍵點，是關係差異和交流矛盾最易於凸顯的地方，並且也是易於暴露權力結構的高壓性和脆弱性的節點。”²⁶不過從這些具體的定義中，還是可以大致看出“社會界面”最為根本的屬性就是在於強調不同社會系統、領域或不同層次之間的連接，它能夠提供一種“有助於對社會異質性、文化多樣性、外來干預過程包含的各種衝突進行探索和理解的途徑。”²⁷而落實於具體操作的“界面分析”強調要找到特定場域中那些關鍵事件加以分析和探尋：如國內一名研究者在研究鄉鎮政權的角色和行為時，選取了涉及上級政府、鄉幹部、村幹部及村民的上訪事件進行界面分析，凸顯了鄉政府的“無奈”處境。²⁸

此處還需略為提及界面分析方法主要服務的研究類型——行動者為導向的研究：此類研究下含三個最重要的核心概念：“社會行動者”、“能動性”與“社會界面”；其中“社會行動者”以多種形式存在，如個人、非正式組織、正式組織、集體甚至國家；²⁹“能動性”指行動者獲取知識（社會經驗）的能力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在各種極端困境下展開行動或應對策略的能力，能動性在社會關係網路中形成並運行且通過一些解釋與互動的關鍵點來維繫著具體的要素（如主張、秩序、商品、工具、資訊等）；³⁰

“社會界面”及界面分析前文已提及，不再贅述。



從後結構主義網路研究特點與行動者為導向的研究特點來看，兩者在具體操作及分析方法上存在著相互借鑒的根基，即二者都有著對行動主體能動性及關係網絡演變的訴求，這也是筆者將“界面分析”作為在後結構主義網路研究可能之方法的前提；二類研究最顯著的區別在於研究旨趣上的差異：前者重在描繪網絡的特性，也可以說更為關注的是一種結構化的結果；而行動者為導向的研究重在分析社會生活中的異質之處是怎樣產生、再產生、得以強化和轉化，可以說更為關注的是一種過程。³¹ “界面分析”作為行動者為導向的研究中常用的一項方法也具備著這種“過程性”特點，而“過程性”無疑是一種較直觀的網路動態化之體現；如果針對網路中某一行動主體採取多個“界面分析”，並且這些“界面分析”具備歷時性特點，那麼不僅從中可以歸納出此一行動主體所在網路的基本特徵，也可以同時展示出此網路的生成演變與行動主體的自我建構，從而獲得一種結構化的結果，完成一項符合後結構主義網路學派基本特性的社會網路研究。

四 “危機—策略”視角下的網路動態圖示—— 一種可能的後結構主義社會網路研究之社會網路圖示

雖然不是所有的社會網路研究都必須提供一種網路圖示，但筆者傾向於認為能夠清晰反映出網路的構成及演變的圖示對於一項網路研究的直觀展現及傳播還是非常有價值的，否則“重視關係圖形的繪製”也不會成為“現代社會網路分析範式”的四大特點之一。³² 誠然圖示的應用易陷入布迪厄所提及的“學院處境”對於實踐緊迫性的擱置，³³ 但也不能因此就放棄“模型化”工具的使用，而是應在運用圖示時，不斷加以反思，是否用“圖示”的邏輯取代了“經驗實例”的邏輯。



“網路圖示”在社會網路研究中的定義非常簡單：即用點表示行動者，用線表示行動者之間的聯繫；初期的網路圖示中各點的相對位置是沒有意義的，³⁴ 關注點主要是網路密度、網路可達性等；至上世紀60年代，借鑒數學領域中的圖論發展出了有向圖後，³⁵ 對網路中的弱聯結及結構洞的關注日益增加；隨著電腦的普及及模型構建的完善，社會網路圖示在呈現上越來越趨於一致，並促使了“社會網路分析範式”的形成。“社會網路分析範式”是一種更強調大規模資料、並依賴於數學或計算模型的網路研究，確切的說，它只是社會網路研究中的一個派別，但此範式隨著電腦的蓬勃發展以及當前一種數字崇拜傾向似乎已經有著要吞噬其他可能的關於社會網路之研究的趨勢，而這或許也正是有學者宣導一種後結構主義網路研究的原因之一。在筆者欲採取基於個案方法研究將打工子弟學校作為行動主體的社會網路時，這種圖形呈現的一致化趨勢對於研究的開展產生了極大的壓迫與束縛，而依筆者拙見，當前標準的網路研究中總被人詬病缺乏動態及跨界分析的主要原因就在於過度的依賴了軟體程式，進而只能採取較大規模的調查研究，而這種大規模調查確實在縱貫研究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困難與局限，從而形成了因歷時性資料不易獲得而難以展開動態網路分析的局面；正是基於以上原因，筆者在研究方法放棄這種規模性調查而依託於“界面分析”的同時，也希望能夠提供另一種形態的社會網路圖。

通常方法與圖示應該配套出現，正如軟體分析與成規模資料的配套出現，基於第三部分所介紹的“界面分析”法，本文欲提供一個以“危機—策略”為視角的社會網路圖。具體來講：此圖示在構圖上有以下特點：(1)由“危機—策略”視角展現的“社會網路”既蘊含著關係也蘊含著資源：首先與關注穩定相互關係的社會網路相比，本文所舉實例的“社會網路”以危機為線索，展現的是不斷被捲入的社會關係；其次與對應於社會資本的社會網



路相比，本文的“社會網路”覆蓋範圍更大，既包含行動主體進行資源動員時所構成的網路，也包含與其對立的網路。³⁶ (2)由“危機－策略”視角展現的“社會網路”是一種較為立體的網路：“界面分析”之於社會網路研究的誘人之處，在於其對跨界跨層次的結構之間互動的關注，依託於此研究方法，本文的“社會網路”將會根據各個危機事件中牽涉的危機製造方與解決方的層次差異，建構“個體行動者”、“機構行動者”、“組織行動者”、“社會情境”四個界面，通過這四個界面內各行動者建立的連接，展現出一種跨層次的網路形態。³⁷ (3)由“危機－策略”視角展現的“社會網路”是一種有具有方向性的壓力傳導機制而形成的網路：雖然就社會網路的動態演化研究來說，連接的有序與否不會影響到對網路形態變化上的分析，但在考察一個社會網路的生成時，連接的有序性是可以較直觀的展現出有哪些潛在節點被捲入了網路，哪些節點發生了異動，並且在勾勒網路資源的動員機制方面具有極大優勢。

簡言之，此處提供一種“危機－策略”視角下的“社會網路”雖然只是源於定性資料，無法滿足社會網路研究中那種用圖形資料對定量分析加以補充的顯著特色，但這種“危機－策略”視角下的社會網路圖相比標準的社會網路圖示來說，無疑在研究問題的現實感上又更近了一步，而增加研究的現實感可以說是各類分析中引入圖示的主要目的之一。

五 方法與圖示的具體應用——打工子弟學校的社會網路

基於前文所述“界面分析”對於關鍵事件的強調，下文在對一種最初源自於一所打工子弟學校生存發展史的考察中選取了危及學校前途命運的四次關鍵事件進行分析，結合“危機－策略”



視角下的社會網路圖示，在展現一種可能的後結構主義網路研究方法與圖示之具體應用的同時，總結出一種打工子弟學校社會網路的一般化模型。

在進行具體分析前，需要對打工子弟學校的社會網路進行界定，依據網路的基本定義：“一組節點及其關係的集合”³⁹，及“界面分析”方法的特性，下文將要研究的打工子弟學校“社會網路”被界定為：在影響打工子弟學校前途命運的危機事件中，不斷被捲入的個體、機構與組織等行動主體及其之間的交互。研究所用的經驗材料來自於對SR學校的調研，SR學校是一所採用“裙帶式家族企業”的運行機制和管理方式且尚未取得辦學資質的民辦學校，⁴⁰在學校當前4名管理者中，校長A是副校長B的親哥哥，是財務C的丈夫，只有主管教學的副校長D因教務經驗豐富受聘而來，B與D入校時間均在08年後，SR學校真正的決策者與創立者是A與C這對夫婦，對於SR的調研也主要以重點訪談A和C為主。

(一) 危機事件1：由房東欺瞞引發的危機及危機應對所形成的界面——個體行動者的捲入

創立於99年的SR學校面臨的首次危機是發生於當年9月至2000年2月間的校舍搬遷事件，依據此次危機的引發及SR學校的應對策略可以將該事件看成如下路徑的集合：1——房東隱瞞事實，將一個要拆遷的房子租給SR，引發危機。2——此危機將“失去校舍”的壓力傳導給SR。3——承受此壓力的SR向房東施壓，希望能維繫已簽的合同。4——房東為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為SR物色到新校舍。5——新校舍房東同意租房給SR，危機得以解決。將上述路徑及事件牽涉的主體用具有傳導性的鏈條加以連接，就可以形成如圖1⁴¹所示的“界面形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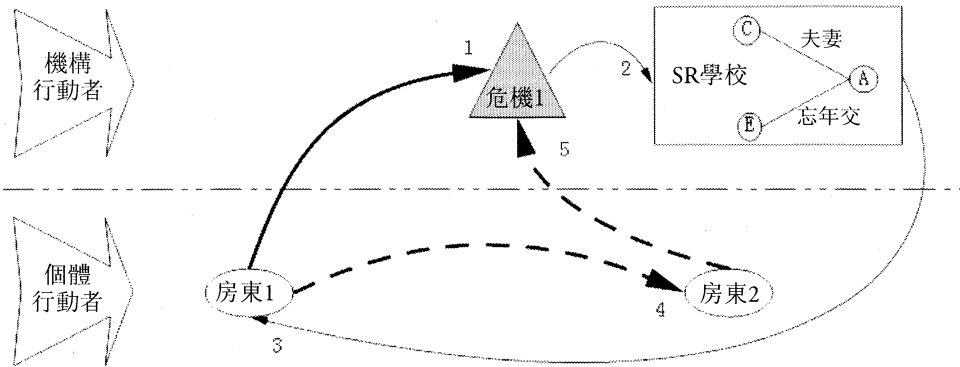
圖1：個體行動者的捲入⁴²

圖1從靜態層面看，涉及主體較少，線條的连接也很簡單。從動態層面看，危機生成途徑只有鏈條1，危機解決途徑為鏈條4→鏈條5，這說明，剛起步的SR在社會網路空間中遭遇的危機成因簡單，作為行動主體其應對危機的策略也較單一，即從危機的直接製造者——另一行動主體“房東”身上尋求突破。

(二) 危機事件2：由政府執法引發的危機及危機應對所形成的界面——組織行動者的捲入

經過兩年積累，SR逐漸獲得口碑、較穩定的生源、教師及校舍，步入穩定發展軌道，但其所在地FT區政府的“態度”，使SR學校在2001年9月至12月間遭遇了第二次危機事件，成為諸多面臨關停的打工子弟學校之一。依據此次危機的引發及SR學校的應對策略可以將該事件看成如下路徑的集合：1——FT區管理部門對打工子弟學校採取高壓政策，危機產生。2——FT區對SR的高壓政策難以貫徹執行，轉而向SR的房東施壓。3——受政府影響，房東要終止租賃合同，加劇了危機。4——危機將關停壓力傳導給SR。5——SR的關停壓力傳導給學生。6——學生的輟學壓力傳導至家長。7——家長為SR物色到一個新的辦學地點。8——新房東同意租房，危機得以解決。將上述路徑及事件牽涉

的主體用具有傳導性的鏈條加以連接，就可以形成如圖2所示的“界面形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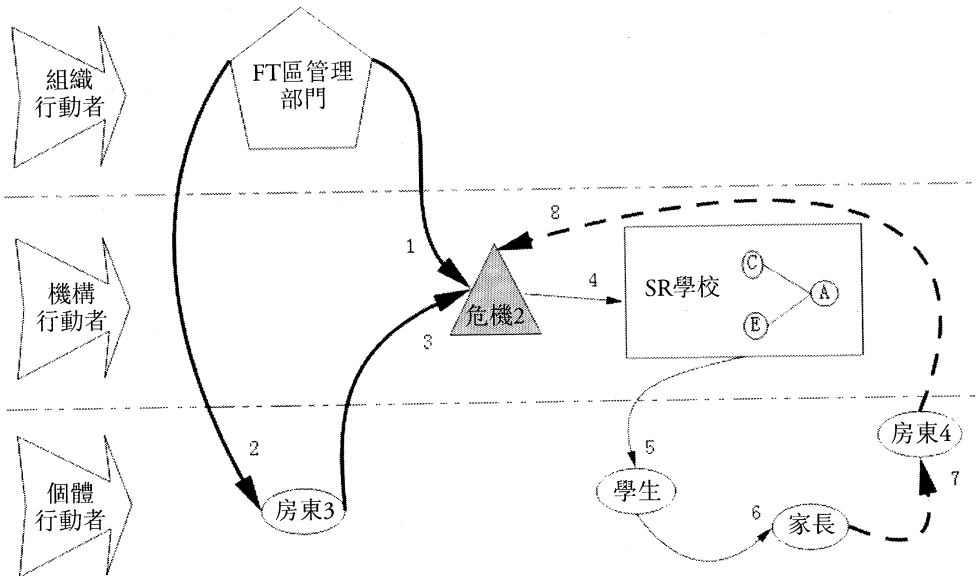


圖2：組織行動者的捲入

圖2從靜態層面看，涉及的主體個數較圖1多，主體層次也擴展至組織行動者一級，但總體而言線條連接仍較簡單。從動態層面看，危機生成途徑為鏈條1→鏈條2→鏈條3，危機解決途徑為鏈條7→鏈條8，這表明，處於穩步發展期的SR在社會網路空間中遭遇的危機成因趨於複雜，作為行動主體的SR應對危機的策略途徑雖然沒有加長，但與危機1相比，此時的SR不僅表現出採取策略的主動性，還體現出快速有效獲得資訊資源的組織性，這大大提高了SR作為行動主體的能動性。

(三) 危機事件3：由非典型性肺炎引發的危機及危機應對所形成的界面——社會情境的影響

再遭遇FT區政府執法引發的關停危機後，SR學校搬遷到了對打工子弟學校態度相對緩和的HD區；HD區的柔和態度使SR從



搬遷的無奈中迅速恢復，2002年春季重新開學後進入更為快速的發展期，然而，突如其來的“非典”，使蒸蒸日上的SR面臨了第三次危機事件。依據此次危機的引發及SR學校的應對策略可以將該事件看成如下路徑的集合：1——非典的社會情境對所有行動主體產生直接影響，SR當時擁有學生近500名，教室狹小學生密集，管理、防治、醫療保險等遠不及公立學校，承受了非典高危易發的壓力。2&3——如何應對非典，政府的決策至關重要，在這種壓力下，關停資質條件無法達到應對非典危機的、人群密集的機構（如學校、企業）是應有之義。政府的政策取向加劇了SR面臨的危機。4——危機產生的壓力傳導至SR。5——SR的校長A通過個人關係網，向師大同學F求助。6——F尋求師大教授的幫助。7——師大教授通過自己的關係網與有關部門打招呼。8——有關部門解決了關停危機。將上述路徑及事件牽涉的主體用具有傳導性的鏈條加以連接，就可以形成如圖3所示的“界面形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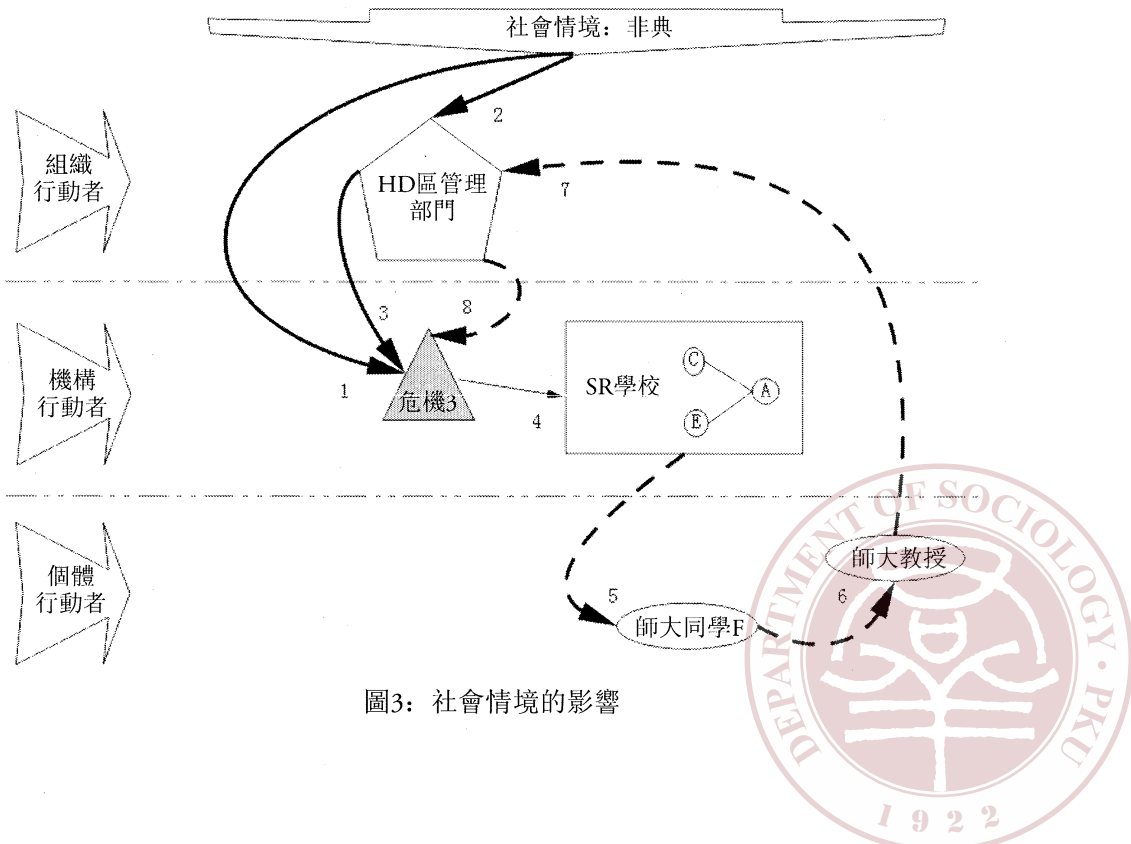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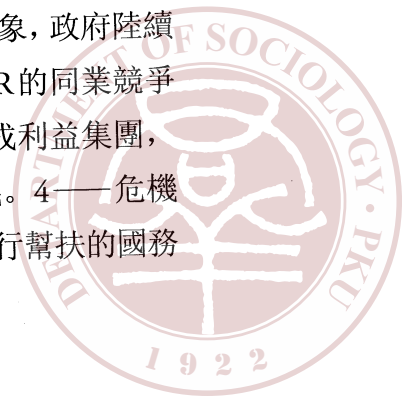


圖3：社會情境的影響

圖3從靜態層面看，涉及的主體個數並不多，線條連接也很簡單，但相比前兩次危機，社會情境的影響成爲主要因素被涵蓋進來，這對SR所在的民辦學校發展場域是一種豐富。從動態層面看，危機生成途徑爲鏈條1→鏈條2→鏈條3，危機解決途徑爲鏈條5→鏈條6→鏈條7→鏈條8，這表明，這一發展階段的SR在社會網路空間中遭遇的危機成因更加複雜，同時，SR的應對策略不再局限於“叫板”（危機1）和“挪窩”（危機2），而是通過第三方介入危機享受“打招呼”的好處，這不僅是行動主體不斷自我發展的結果，也是潛在社會資源運作能力有長足進步的表現。

（四）危機事件4：由城市改造引發的危機及危機應對所形成的界面——利益集團的博弈

SR在HD區不僅渡過了非典危機，也渡過了一段“最消停”的辦學歲月，但至2003年末，由於LS路的修建，學校被迫搬遷到辦學環境較爲寬鬆的SJS區YM口。歷經三年休養生息後，2006年由於生源擴大校舍不足，A和C決定租用附近舊貨市場內一片面積爲4824平米的土地，租期10年，投資60多萬（自有積蓄30萬，向親戚朋友借款30余萬，不是法人單位故不能向銀行貸款）在新校區建校舍。按A和C的打算，建成後新校舍將辦成初中部，原校舍爲小學部。然而，2006年8月，新校舍尚未建成，由2008奧運會引發的城市改造使得SR的辦學戛然而止，遭遇了創校以來最爲嚴峻的危機事件。依據此次危機的引發及SR學校的應對策略可以將該事件看成如下路徑的集合：1——確保08奧運成功舉辦的壓力作用於政府，政府採取城市改造等政策。2——尚未取得辦學資格的打工子弟學校軟硬體設施確實較差，影響城市整體形象，政府陸續下文取締“非法”打工子弟學校，危機形成。3——SR的同業競爭者“HA校長”、與“科長”、“地主”、“房東”結成利益集團，以將SR排擠出打工子弟教育市場爲目的，加劇危機。4——危機產生的關停壓力傳導至SR。5——SR求助於曾對其進行幫扶的國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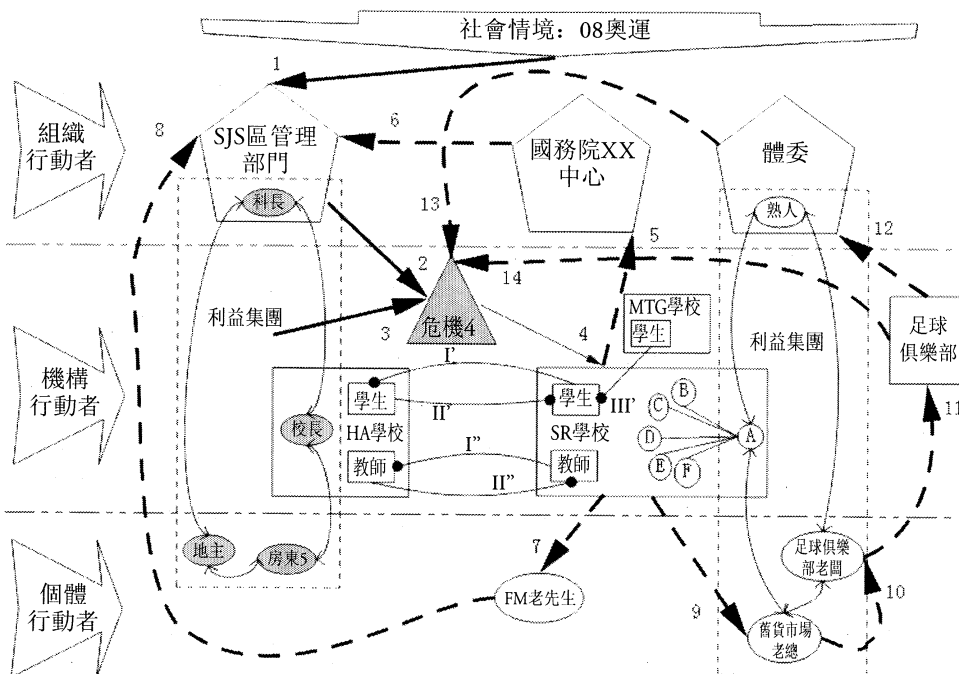


圖4：利益集團的博弈

院xx中心。6——國務院xx中心某部長為SR向有關部門求情打招呼，沒有效果。7——SR求助於教育界前輩FM老先生。8——FM老先生親自去找有關部門商談，以失敗告終。I' & I''——解決危機的嘗試均失敗，SR只能暫時關停學校，並將500多名學生及20多位老師轉給HA學校。9——不甘心就此關停學校，依託新地主（舊貨市場老總）SR打算東山再起。10——東山再起需要解決資質問題，通過新地主結識了一名足球俱樂部老闆。11——SR與俱樂部老闆合作辦學，以足球俱樂部為名掛牌招生，既辦農民工子弟學校，也培養足球苗子。12——足球俱樂部資質的審批上報體委。13——體委同意俱樂部的設立，SR由此繞開教委得以重新開辦；教委曾採取措施阻撓，但在俱樂部老闆的斡旋下，最終不了了之，至此，危機得以初步解決。II' & II''——“俱樂部”正式成立後，之前轉給HA學校的學生與老師出於對SR的信任，



離開HA學校，來到“俱樂部”。III'——即將被取締的MTG學校出於對SR的認同，拒絕HA出錢爭生源的做法，免費將七八十名學生轉給“俱樂部”。14——“俱樂部”成立之初招收學生300多名，陸續獲得從HA學校、MTG學校轉來的學生和教師，SR恢復逐漸元氣，步入正軌，以校長A、舊貨市場老總、俱樂部老闆、體委某“熟人”結成的利益集團，徹底鞏固了SR的生存狀況。將上述路徑及事件牽涉的主體用具有傳導性的鏈條加以連接，就可以形成如圖4所示的“界面形態”。

圖4從靜態層面看，涉及的主體個數相當多，線條連接非常複雜，主體的層次涵蓋了個體、機構及政府組織，也突顯出社會情境的巨大影響，可以說，圖4基本囊括了SR在社會網路空間中可能遭遇的主體類別及關聯，是對民辦學校發展場域較為詳盡的勾勒。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出現了涵蓋個體行動者、機構行動者、組織行動者三個層次的利益集團（參見圖4虛線矩形框），當危機製造方的利益集團對SR這一機構行動者施加壓力時，SR被迫關停，直至危機解決方形成涵蓋三個層次的利益集團，SR才得以借殼重起。從動態層面看，危機生成途徑為鏈條1→鏈條2→鏈條3，危機解決途徑為鏈條5→鏈條6→鏈條7→鏈條8→鏈條9→鏈條10→鏈條11→鏈條12→鏈條13→鏈條14，這顯示了SR面對危機所採取策略的多面化與複雜化，突顯出行動主體在能動性上的大幅提升。

（五）打工子弟學校社會網路的一般化模型⁴³

綜合考察“危機—策略”視角下所得的4幅網路界面圖，可以抽象出打工子弟學校社會網路構型的一般化模型。這個模型不僅展現出作為網路中心節點的行動主體的一般特徵，同時能夠突顯打工子弟學校的社會網路從生長、異動、穩定直至博弈的階段性特徵。



1. 行動主體的一般特徵

處於社會網路中心節點的行動主體，在自我建構中展現出兩個特徵：

(1) 能動性的增殖

在創校初期，作為行動主體的SR遭遇房東欺瞞引發關停危機時，僅有最為樸素的應對策略，即“叫板”——向危機製造方直接施壓以應付危機；隨著社會網路的擴展，當面對政府執法引發的危機時，SR已擁有兩種應對策略，一是“談判”——與危機製造方協商，二是“挪窩”——依靠潛在社會資源尋求新的辦學條件；到非典所引發的危機時，SR有了“打招呼”的能力——請第三方介入危機，與有關部門進行溝通；最後，在應對08奧運引發的危機時，SR已具備動員組織、機構、個體等多層次社會行動者的能力。譬如，SR成功地獲得國務院xx中心的關注，成為其幫扶部門，進而成為其應對危機時可動員的資源；成功地獲得其他民辦學校的尊敬，進而在MTG學校解散時獲得其生源；成功地獲得教育界前輩及當地實權人士的支持，進而借助其力量東山再起。更重要的是，此時的SR已具備“抱團”——組建利益集團的能力，這使其能更為充分地調動社會網路的潛在資源，更為有效地分散競爭博弈中的壓力。簡言之，行動主體的社會網路伴隨著能動性的增殖，體現在日常中是潛在社會資源的不斷增長，體現在危機中是應對策略的日益豐富。

(2) 行動的取向

在應對四次危機的過程中，SR秉持打工子弟理應享受義務教育的立場，向政府部門申訴自身生存之必要，向社會各界尋求自身發展之需要，對其行動取向的研判，不妨與同為民間機構的非營利組織進行簡單的橫向比較。有研究指出，中國非營利組織通過為社會公眾特別是弱勢群體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的方式，達到滿足社會公眾需求、維護社會公正的目的，其行動既有價值追



求，又有行動目的和現實手段的權衡，⁴⁴ 屬於價值合理性與目的合理性統一的行動。相比而言，SR的危機應對舉措以生存發展為第一要務，而生存發展中對經濟的考量明顯多於教育理念的實踐，因而歸根結底屬於維護自身利益的目的合理性行動，但其行動在具有目的合理性的同時，又因其社會效應而具有價值合理性。事實上，這種行動取向正顯示出打工子弟學校作為一個時代性產物的特徵，即其存在基礎是大量外來務工者子女的教育需求不能通過現有教育體制得到滿足，一旦這種教育需求的總量減少，或被其他途徑加以解決，就會對打工子弟學校的生存予以決定性打擊，因之，打工子弟學校無法堅守一種持久的價值和信仰，而只能依照市場邏輯給教育事業以有益補充。

統言之，在危機生成及解決這一利益主導型事件中，行動主體一方面通過能動性的增殖進行著自我建構，另一方面通過目的合理性行動爭奪生存空間。

2. 社會網路的階段性特徵

打工子弟學校的社會網路一般化模型涵蓋四個發展階段：生長、異動、穩定及博弈。

(1) 網路的生長

A 遞進式的社會捲入。“危機1”由個體引發，在進行資源動員時，也只涉及個體層次；“危機2”中組織行動者捲入了社會網路；“危機3”突顯出社會情境對各層次主體的影響；“危機4”則是在社會情境的強烈影響下，所有層次主體持續捲入的複雜博弈過程，博弈的雙方都出現了涵蓋組織行動者、機構行動者、個體行動者三個層次的利益集團。

B 危機參與主體數量的增多。“危機1”的製造方只涉及1個主體，解決方亦只有1個；“危機2”的製造方涉及2個主體，解決方3個；“危機3”看似製造方只有1個，解決方3個，但不



能忽略受“非典”社會情境影響的各層次主體；“危機4”的製造方則涉及4個主體，解決方主體數量達到8個。

C 危機生成與解決的鏈條趨於加長。“危機1”的生成途徑及解決途徑均各涉及1段鏈條；“危機2”的生成鏈條達到3段，解決鏈條為2段；“危機3”與“危機4”，雖然生成鏈條上加長不明顯，但解決鏈條分別達到4段和10段。

(2) 網路的異動

社會網路生長過程中伴隨著節點（主體）的異動。被捲入網路的主體的作用並不始終如一，隨著社會情境的影響或潛在資源的動員，在利益的導引下，其作用的大小甚至方向都可能發生變化。如，“危機1”的房東1既是危機製造方，也促成了危機的解決；“危機2”的房東3原是SR的支持者，但在高壓下提前終止合同加劇了危機；“危機3”的“非典”社會情境中，HD區管理部門並不只是危機製造方，也發揮著緩解危機的作用；“危機4”中發生異動的節點更多，SJS區管理部門對SR的態度由表揚變成了取締，原校舍房東為了更多收益由支持走向了對立，MTG學校則由競爭者轉而成為支持者，舊貨市場老總、俱樂部老闆、體委的“熟人”則由於利益集團的形成不斷加大對SR的支持力度。

(3) 網路的穩定

社會網路的生長及異動達到一定階段，自身會逐漸穩定下來。網路的穩定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網路中的節點數量，二是節點在網路中的權重。前者意味著，網路的穩定依賴一定數量的節點來維繫，若網路節點數目過少，則任何兩個節點間連接的斷裂都將嚴重影響網路的形態。如，在“危機1”中，整個網路只涵蓋三個主體，若SR與房東1的連接發生斷裂，則危機可能無法得到解決。後者意味著，網路中的各節點對危機生成或解決所起的作用並不一致。如，在4幅網路構型圖，組織行動者的影響效果要明顯強於其他節點。這可以理解為，打工子弟學校大都沒有合法



辦學資格，由於缺乏體制的支持，經濟、政治、文化資本均有所欠缺，面對危機通常只能求助於社會資本，由於辦學受政府多個部門管轄，政府在其社會網路中往往處於頂層，因而成爲其資源動員的訴求對象。一般而言，社會網路的穩定性通常由規範和信任來維繫，但在打工子弟學校的社會網路中，政府作爲規範的制定及執行者，成爲整個網路穩定性的主宰力量。

(4) 網路的博弈

“危機4”的生成機制較爲複雜，其解決也動用了SR幾乎全部社會資源。與前3次危機相比，危機製造方率先結合成利益集團，由於涵蓋所有三個層次的行動主體，甫一出現就使SR陷入四面楚歌的重重困境，SR的初始應對仍採取分別調動各層次行動主體的老辦法，其結果是顧此失彼，最終被迫暫時關停。當SR意識到對手不是某個單獨的行動主體而是跨層次的利益集團時，組織己方的利益集團成爲當務之急。“抱團”策略使SR“鑽了個空子”得以東山再起，採用“挪窩”策略而未能及時組建利益集團的MTG學校則被排擠出局。在接下來的利益集團的博弈中，由於擁有與對立面旗鼓相當的所有三個層次的行動主體，SR成功抵擋住各方壓力獲得了生存發展空間。抽象而言，行動主體爲爭奪稀缺資源結成利益集團，使已經穩定的網路產生大幅振動，在博弈中優勝劣汰形成新的網路形態。

六 結語

本文嘗試爲後結構主義網路研究所提供的方法及圖示或許尚待考證，但無法否認的一點是全文基於“危機一策略”視角進行了一種對行動主體生存的網路空間及自身建構方面較爲全面的考察，這種對打工子弟學校所處的社會網路空間的關注相較



於那些最終將此類機構面臨的問題都歸結為資金不足、辦學條件差、無合法資質等來說，無疑有利於探討那些更為立體和深刻的原因。在全文理論訴求方面，依託於個案式的研究所歸納出的打工子弟學校社會化網路的一般化模型，雖然不是依據量化資料而推出的，但較於標準的社會網路研究對於網路結構的強調來說，這種基於個案式的研究也可以在網路結構方面有所作為。如，本文得出的打工子弟學校社會化網路的一般化模型所體現的結構是一種以捲入結點順序大致相反的狀態，即在整個網路中後捲入的政府往往在網路的穩定及變動上發揮著主導因素，但這並不意味著打工子弟學校這樣的行動主體所處的結構位置會隨著網路主導力量的影響而輕易發生變化，比如SR在與一個有合法資質（政府支持）的HA學校競爭中，雖然經歷暫短的關閉，但最終還是依靠其自身的社會資本東山再起與之處於大體相當的網路位置中；此外，在以軟體程式驅動的網路研究中，通常都下含對小集團的分析，而這種基於個案分析式的研究其實在小集團的分析上更加翔實生動。依託於歷時性危機事件的個案式分析在網路研究中最主要的長處是對網路中行動主體能動性的體現及網路生成演變之脈絡，不過在標準網路研究中對結構對等或中心性等關注點上，確實存在缺陷，而如何儘量彌補這一不足：如去拓展更多基於類似分析的其他行動主體的個案還是繼續在同一主體個案中挖掘其他可能相關因素，這些都是可以繼續深化後結構主義網路研究可能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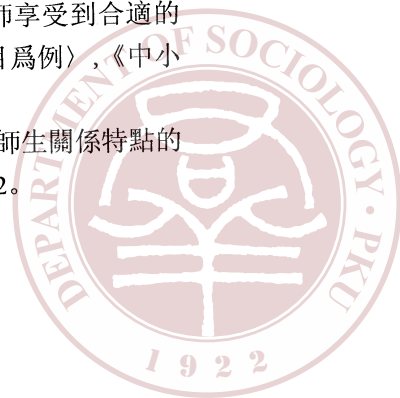
後結構主義網路研究是一種包容性很強的研究，它鼓勵嘗試進行多元化的研究，但研究的多元化勢必會使得如何評價一種研究成果面臨著巨大的挑戰；⁴⁵ 而評價上的困難帶來的一個可能結果就是很多或許已經做過與本文類似的研究成果無法被公開發表，從而使本文只能在沒有可借鑒或參照的前提下進行分析研究，這多少難免令人底氣不足並夾雜著跳脫既有範式後的惴惴不



安，面對此種困境支撐筆者艱難前行的惟有此研究的實踐意義及如下呼籲：“後結構主義網路研究要求對聯結關係形成和演變的社會情景做更為細緻的考察。我們期待著看到更多的關於網路聯結的翔實的案例研究，同時也希望更少有人武斷地漠視對那些嵌入於當地特殊場景中的社會聯結的研究。”⁴⁶

注釋

- 1 馬汀·奇達夫、蔡文彬，《社會網絡與組織》，王鳳彬、朱超威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22。
- 2 林頓·c·弗里曼，《社會網絡分析發展史——一項科學社會學的研究》，張文宏、劉軍、王衛東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5。
- 3 馬汀·奇達夫、蔡文彬，《社會網絡與組織》，王鳳彬、朱超威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76。
- 4 Boissevain, J, “Network Analysis: A Reappraisal,” *Current Anthropology* 20 (1979), 393.
- 5 Emirbayer, M, and Goodwin, J, “Network Analysis, Culture, and the Problem of Agenc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9 (1994), 1413.
- 6 馬汀·奇達夫、蔡文彬，《社會網絡與組織》，王鳳彬、朱超威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146。
- 7 陶紅梅等，〈北京打工子弟學校與公立學校初中生心理健康狀況的比較研究〉，《中國特殊教育》第九期（2004），87-92；王東等，〈北京市5所打工子弟學校學生健康需求評估分析〉，《中國學校衛生》第一期（2011），17-19。
- 8 王冰等，〈城市打工子弟學校學生基本認知能力調查〉，《職業與健康》第十六期（2010）。
- 9 何穎，〈打工子弟學校教師的繼續教育需求調查研究——以北京市五所打工子弟學校教師為對象〉，《教育理論與實踐》第十一期（2008），47-49；李亞軍與楊蘭，〈項目合作：讓打工子弟校教師享受到合適的培訓——以貴州貴陽市四所打工子弟學校教師培訓項目為例〉，《中小學管理》第七期（2011），28-29。
- 10 謝尹安等，〈北京市公立學校與打工子弟學校流動兒童師生關係特點的比較研究〉，《中國教育學刊》第六期（2007），9-12。



- 11 金美麗，〈淺談打工子弟學校圖書館的建設〉，《山東圖書館季刊》第四期（2008），75-78；霍笑敏、付浩與趙雨，〈北京市打工子弟學校開展體育援助的研究〉，《運動》第二期（2010），67-69。
- 12 徐煥文與楊立霞，〈我國打工子弟學校存在的問題及解決對策探析〉，《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二期（2010），79-81；周莫也，〈打工子弟學校的合法性爭議問題的解決對策——基於北京市海澱區打工子弟學校的調查研究〉，《法制與社會》第二期（2010），70-72；姚薇薇，〈北京城市打工子弟學校的現狀和問題〉，《北京社會科學》第三期（2010），78-81。
- 13 任永傑，〈城市角落裏的“普九”主力軍——北京13所打工子弟學校師資情況報告〉，《中國改革（農村版）》第八期（2003），59-61；呂紹青與張守禮，〈城鄉差別下的流動兒童教育——關於北京打工子弟學校的調查〉，《戰略與管理》第四期（2001），95-108。
- 14 王中會、藺秀雲與方曉義，〈公辦學校和打工子弟學校中流動兒童城市適應過程對比研究〉，《中國特殊教育》第十二期（2010），21-26；謝尹安、鄒泓與李小青，〈北京市公立學校與打工子弟學校流動兒童師生關係特點的比較研究〉，《中國教育學刊》第六期（2007），9-12。
- 15 姚薇薇，〈北京城市打工子弟學校的現狀和問題〉，《北京社會科學》第三期（2010），78-81；徐煥文與楊立霞，〈我國打工子弟學校存在的問題及解決對策探析〉，《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二期（2010），79-81；劉慧涵，〈北京打工子弟學校的困境及學校社會工作的介入——以北京石景山HA打工子弟小學為例〉，《社會工作（下半月）》第九期（2010），40-42；陶紅、楊東平與李陽，〈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狀況分析——基於我國10個城市的調查〉，《教育發展研究》第九期（2010），6-9。
- 16 馬汀·奇達夫、蔡文彬，《社會網絡與組織》，王鳳彬、朱超威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129、146。
- 17 馬汀·奇達夫、蔡文彬，《社會網絡與組織》，王鳳彬、朱超威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132頁表6-1、145。
- 18 馬汀·奇達夫、蔡文彬，《社會網絡與組織》，王鳳彬、朱超威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143、145。
- 19 馬汀·奇達夫、蔡文彬，《社會網絡與組織》，王鳳彬、朱超威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143。
- 20 馬汀·奇達夫、蔡文彬，《社會網絡與組織》，王鳳彬、朱超威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146。
- 21 何雪松，〈社會網絡的動態過程及理論探索〉，《上海行政學院學報》第三期（2005），78-79。



- 22 馬汀·奇達夫、蔡文彬，《社會網絡與組織》，王鳳彬、朱超威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140–141；Burt, R.S. and D. Ronchi, “Contested control in a large manufacturing plant,” in *Social Networks through Time*, ed. J. Wessie and H. Flap, eds., (Utrecht, Netherlands: ISOR, 1990), 121–157; Larson, “A Network dyads in entrepreneurial settings: A study of the governance of exchange relation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7 (1992), 76–104; Kapferer, B., *Strategy and Transaction in an African Factory* (Manchester: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Press, 1972).
- 23 葉敬忠與李春艷，〈行動者為導向的發展社會學研究方法——解讀《行動者視角的發展社會學》〉，《貴州社會科學》第十期（2009），78。
- 24 Norman Long, *Development Sociology: Actor Perspectives* (Routledge, 2001), 69; 葉敬忠與李春艷，〈行動者為導向的發展社會學研究方法——解讀《行動者視角的發展社會學》〉，《貴州社會科學》第十期（2009），78。
- 25 葉敬忠與李春艷，〈行動者為導向的發展社會學研究方法——解讀《行動者視角的發展社會學》〉，《貴州社會科學》第十期（2009），72–78。
- 26 葉敬忠與那鯤鵬，〈發展幹預社會學研究綜述——解讀《尋找中間地帶——發展幹預社會學研究》〉，《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三期（2008），48–49。
- 27 葉敬忠與李春艷，〈行動者為導向的發展社會學研究方法——解讀《行動者視角的發展社會學》〉，《貴州社會科學》第十期（2009），78。
- 28 饒靜，《楊鄉政權：依附型行動者——後稅費時期我國農業鄉鎮政權的角色和行爲分析》（中國農業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
- 29 饒靜，《楊鄉政權：依附型行動者——後稅費時期我國農業鄉鎮政權的角色和行爲分析》（中國農業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14。
- 30 葉敬忠與李春艷，〈行動者為導向的發展社會學研究方法——解讀《行動者視角的發展社會學》〉，《貴州社會科學》第十期（2009），78。
- 31 葉敬忠與李春艷，〈行動者為導向的發展社會學研究方法——解讀《行動者視角的發展社會學》〉，《貴州社會科學》第十期（2009），78。
- 32 林頓·c·弗里曼，《社會網絡分析發展史——一項科學社會學的研究》，張文宏、劉軍、王衛東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3。
- 33 即圖式、圖表等“模型化”工具在自身運轉中，會再生產出屬於它們結構的社會狀況的預先假設，從而擱置了實踐邏輯。參見布爾迪厄，《實踐理性——關於行爲理論》，譚立德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205。
- 34 林頓·c·弗里曼，《社會網絡分析發展史——一項科學社會學的研究》，張文宏、劉軍、王衛東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21。



- 35 馬汀·奇達夫、蔡文彬，《社會網路與組織》，王鳳彬、朱超威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44。
- 36 此特點是相對目前談及社會網路，必言“社會資本”的一種回應，“社會網路”與“社會資本”經常同時出現並交相定義，時或重合，時或包含，如有學者認為“社會資本即社會網路關係”，有的則認為“社會資本即社會網路結構”，還有的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社會網路資源”；也有學者明確對二者進行了區分，認為“社會網路是潛在的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是動用的、用來投資的社會網路；社會網路是社會資源，但是不一定是直接的社會資本”等，參見邊燕傑，〈城市居民社會資本的來源及作用：網路觀點與調查發現〉，《中國社會科學》第三期（2004），137。張文宏，〈中國社會網路與社會資本研究30年（上）〉，《江海學刊》第二期（2011），107。依筆者之見，其實不論各種研究者在對待“社會網路”與“社會資本”的涵蓋範圍採取何種視角，有一點是可以明確的，即在實體層面，社會網路所涵蓋的範圍不小於社會資本。
- 37 此點是相對當前社會網路圖中節點性質同質化（即網路圖中的節點要麼全是個人、或者是同類型企業組織等）的一種回應。
- 38 此點是相對當前社會網路圖中節點間的連接無序性而言的。
- 39 Brass, D. J., “A 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 on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Research in Personnel and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ed. Gerald R. Ferris (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95), 42.
- 40 關於“裙帶式家族企業”的運行機制和管理方式參見朱誌勇與徐蕾，〈社會資本在民辦學校發展機制中的運作邏輯：個案分析〉，《清華大學教育研究》第四期（2006），63-70。
- 41 本文所用圖示（總共4幅）及圖示說明為筆者與另外一名研究者朱洵共同商討而定，特此注明。
- 42 圖示元素說明：在本圖及以下各圖中，危機以三角形表示，個體行動者以圓形表示，機構行動者以矩形表示，組織行動者以五邊形表示；危機制造方位於圖示左半部分，危機解決方位於圖示右半部分；危機生成鏈條為粗實線，壓力傳導鏈條為細實線，危機解決鏈條為虛線。
- 43 此處內容得到了另一名研究者朱洵的大量修正補充及完善，特此注明。
- 44 王冠，〈行動視角下的非營利組織發展〉，《學會》第九期（2010），8。
- 45 馬汀·奇達夫、蔡文彬，《社會網路與組織》，王鳳彬、朱超威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141。
- 46 馬汀·奇達夫、蔡文彬，《社會網路與組織》，王鳳彬、朱超威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140。

